

十日刊 第三十一期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日本林內閣的透視

林雲谷

外交官的政治任命

張匯文

『誰都知道，外交官未必即是外交家……其令人難以了解的乃是：何以吾國這多年來，祇見增加一批一批的外交官，而不見產生一個出色的外交家？』

看了雷雨之後

中國工業化中之勞力問題

吳至信

『南京之紡業，因國內上流人士而今喜用毛織品及外貨，以致失業者十餘萬人。』

北平的學聯

白文

每份售洋五分

全 年 二 元
(郵費在內)

廣戶氏

筆墨文具紙張
機關學校用品
一應俱全

老胡開文筆墨莊
上海總店英租界拋球場
南京分店太平路門帘橋
電話二二一六一號

裝璜精美
地點適中
西餐名點

禮查咖啡館

中山東路 68-70

招待週到
一應俱全

是非公論第三十一期

本刊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 謄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 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 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 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 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 來稿請寄交南京珠江路二十二號本社編輯部。

內容

日本林內閣的透視	林雲谷(一)
外交官的政治任命	張淮文(四)
從提攜說到抗戰	于西華(二)
中國工業化中之勞力問題	吳至信(四)
看了雷雨之後	鑑清(三)
通訊：北平的學聯	白文(三)
書評：大陸法在十九世紀之進步	李子欣(四)

日本林內閣的透視

一月下旬發生的日本政潮，首爲政黨在議會猛烈抨擊軍部，代表軍部的陸軍大臣堅決主張解散議會，致廣田內閣陷於內部不統一而總辭職。繼爲宇垣一成奉命組織新閣，受軍部拒絕推薦新陸軍大臣的阻撓，終於流產。迄二月二日林銑十郎繼起組織新閣成功，波蘭迭興的政潮始漸告一段落。這次政潮，形勢雖不如「五一五」及「二二六」兩次政變那樣嚴重，然其影響於日本的政治的演變，却可以等量齊觀。

日本自一九三一年秋開始強佔我們中國的東北四省以來，其向外侵略所造成的隨時可以發生國際戰爭的形勢，便成爲其內政外交所要處理應付的中心問題。而關於解決這個問題的方策，則軍部、政黨、財閥、官僚等內政外交上的指導勢力，自始即見解各異，並且爭執極烈。這幾年來，從若槻內閣一變爲犬養內閣，再變爲齋藤內閣，三變爲岡田內閣，四變爲廣田內閣，以迄這次林內閣成立，已爲五變。每次政變勿論其情況如何，總是給人看見其明爭暗鬥的形跡。所謂穩健派與急進派的磨擦，現狀打破派與

現狀維持派的相持，自由主義派與統制主義派的衝突，政黨政治派與法西斯蒂派的對立，這些都是說明其橫互軍政財各界的明爭暗鬥的名詞。而因這些名詞，始終不能完全確定其內政外交上的指導勢力的分野，所以經過了長期的明爭暗鬥，關於指導向外侵略爲中心的內政外交方針，依然是在齋藤、岡田、廣田三個軍閥官僚政客混合組成的中間內閣主持之下，努力綜合各方的意見，而作折衷的試驗。但這種試驗的工作，因其屬於不偏不倚的調和性質，結果不是穩健的人認爲過火而反對，就是急進的人看作退步而攻擊，所以，無論齋藤內閣也好，岡田內閣也好，廣田內閣也好，總是於成立之始即忙於應付左右的夾攻，到了最後便經不起一方面的攻擊而下台，將向外侵略，所引起的內政外交問題，留給後任內閣去料理。

從日本開始強佔我們中國的東北四省至今，在不願將東北四省歸還我們中國這一點上面，固然似乎已成爲其舉國一致的見解，可是，我們中國爲保持自身的生存權起見，絕無讓其永遠佔據東北四省的意思。這一點，即爲其始

終不能安枕的因素。加之，歐美各國爲保持國際均勢起見，亦斷無任其肆意強佔我們中國的東北四省之理。這一點，也是其始終不能無憂的地方。在這種情勢之下，日本軍政各界的少壯份子的態度，顯然傾向於貫澈武力萬能主義，但其老成份子却不能完全跟着少壯份子向立即孤注一擲的冒險路上跑。急進派與穩健派的磨擦，便由此而出現。

而因急進派與穩健派的分野，不惟不是一如平常所區劃的軍部與財閥，或政黨與官僚，而且這兩派的對立抗爭，實橫亘在各內政外交的指導勢力裏面。無論軍部也好，政黨也好，財閥也好，官僚也好，其內部的對立抗爭，是一直繼續到現在，構成一個綜錯複雜的奇特狀態。每經一次和平的或激烈的政爭，橫亘各指導勢力之間的急進與穩健兩派，一方面是彼此不願退隱，他方面則互相顧全大局，到了最後便勉強混合軍閥官僚政客組成所謂舉國一致的中間內閣，以應付向外侵略進行中的國內和國際的嚴重情勢。所以，這幾年來，日本內政外交的動向，可以說是一邊迎合急進派的主張，致力擴軍備戰，以期「戰則必勝」，一邊順從穩健派的意思，致力外交活動，以期「不戰而勝」。

不過，在「戰則必勝」的前提下，少壯派認爲這幾年來的擴軍備戰，因受穩健思想的梗阻，猶離理想的國家總動員計劃太遠，必須打破現狀，建立強有力的政府，以便實行統制經濟，樹立戰時準備體制，才有取得未來的戰爭勝利的希望。而在「不戰而勝」的前提下，老成派認爲這幾年來的外交活動，因受急進動向的影響，致絕少心滿意足的成就，必須維持現狀，以不怕戰爭但願避免戰爭的姿態，繼續向外威迫利誘，使我們中國以及歐美諸國受其操縱愚弄，才有取得未來的外交勝利的希望。這兩種向外侵略的目標相同，而方法稍異的爭執，本是這幾年來日本政治不安的因素，益以急進派中，有不少痛恨資產階級的養尊處優及壓惡黨人政客的腐敗墮落的人，他們抱着乘擴軍備戰的機會而推翻政黨政治及改革經濟機構的企圖，引起穩健派的不安，促成他們盡力維持現狀的決心。所以這幾年來，日本的急進派與穩健派的國策爭執，逐漸牽涉到思想衝突階級對立的上面去，而政治的不安便隨之而加甚。除了急進與穩健之外，尚有打破現狀與維持現狀，自由主義與統制主義，政黨政治與法西斯等對立抗爭的名詞出現。

自然，我們看了這幾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波瀾，如「五一」兇案，「神兵隊」事件，「二二六」兵變，宇垣內閣流產等等，定當以爲急進派的抬頭已無疑問。可是，直到林內閣成立的現在，穩健派的地位未被推翻的事實，亦非我們所能否認的。據作者近數年來一貫的觀察，從齊藤內閣成立至今，軍政財各界的上層領袖，是始終在顧全大局協力對外的大前提之下，作互相讓步共謀國是的進行，期在此不偏不依的進行中，將急進與穩健的兩種意見加以折衷，藉此調和少壯與老成兩派的對立抗爭。他們這種融合內部意見的工作，如果簡單的具體的說，就是元老重臣不再推薦政黨領袖組閣，軍部致力清除激烈份子的肅軍運動，議會承認軍部的擴軍預算，政府推行避免戰爭的侵略外交等等。而這次林內閣的成立，亦依然是軍政各界上層領袖互相讓步共謀國是的結晶。

林內閣的外表，雖與齊藤、岡田、廣田三內閣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最顯着是閣僚中無一政黨中人，連着名政客山崎達之輔亦於入閣爲農林大臣兼拓務大臣之前，聲明脫離昭和會的黨籍。其次爲各省大臣多爲兼職，致全部閣僚，自總理大臣以下，應有十三人，的僅有八人。然而，林

閣的本質，當與齊藤、岡田、廣田三內閣沒有什麼差異，至少在以融合急進與穩健兩派意見爲使命的一點上，是完全一樣。因爲日本現在乃繼續強佔我們中國的東北四省，便不能不繼續擴軍備戰及外交活動求達其侵略我們中國的目的。在這種情勢之下，林內閣唯有踏襲前內閣的後塵。一方面是依急進派的意見而繼續擴軍備戰，及依穩健派的意見而繼續外交活動，藉此實現「戰則必勝」或「不戰而勝」的計劃，以融會兩派的對外意見。他方面則貫澈軍部的肅軍運動及政界的清黨運動，藉此完成掃除激烈份子及腐化份子的工作，以融合兩派的對內企圖。

所以，林內閣成立以後的日本，除非國際情勢有重大的變化，則其對外的備戰外交雙管齊下的政策，當不會有什麼改變。而因其對外政策一時不致變更，故其內部的肅軍清黨運動，當必繼續進行。尤其是民政黨政友會兩大黨的清黨運動，恐更不能避免。至於議會制度的修正，行政機構的改革，統制經濟的實行，這些都是擴軍備戰進行中應該做的工作。林內閣爲完成這融合急進兩派於一體的使命計，當以不急激的態度，漸次促其實現。

(林雲谷)一九三七、二、三、

外交官的政治任命

「有些人被派到外國去，是因為外國需要他們；有些人被派到外國去是因為國內不需要他們」。

美前國務卿西維德(Seward) 言。

頑皮兒童初學會說議話，討好父母，老人家往往高興得說一句『這孩子真聰明，將來必成一個外交家』。油頭滑腦的西裝少年，說幾句半通不通的英文，便以為有外交家的天才，自命不凡。大學生讀了一二門與國際公法有關係的課目，畢業後竟敢以『專門外交』問世。諸如此類的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不斷的聽到，見到。難道，做一個外交家真的如此容易？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不斷的聽到我們的外交官所鬧的種種辱國辱已的笑話，更不斷見到下台的軍閥政客一個個出使外洋，使我們不由得又感覺，在中國作一個外交官果真也不難。

誠然，誰都知道，外交官未必即是外交家，正如外交未必盡是外交官一樣；其令人難以了解的乃是：何以吾國這多年來，祇見增加一批一批的外交官，而不見產生一

個出色的外交家？李鴻章以『怪』見著於世，有中國外交家的稱呼，可是自李鴻章以後，我們則僅僅聽到在巴黎和會和華府會議稍露頭角的顏惠慶，顧維鈞、王正廷一流人。這些人，經過時間的測驗，他們的才能充其極僅能作一個『不求有功祇求無過』的外交官而已，算不得出色的外交家。以收回漢口租界而出名的陳友仁，曾一度被視為革命式的外交家，然而不幸曇花一現，他早已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被忘人』(Forgotten man)。時至今日，國際局勢日趨嚴重，我們不僅感覺外交家的極端缺乏，就是連『無功無過』不鬧笑話的外交官也漸感稀罕。個中原因，頗有仔細研究之必要。

有人說，中國是一弱國，『弱國無外交』，故不易產生外交家。此說似很動聽，而實則不盡然。歷史上以弱小而蔚為大邦，以喪亂而臻於富強的國家，不知有多少。例如維也納會議後的法國，統一前的意大利，都何嘗是當時的強國，但有台列蘭Talleyrand倡『法統主義』(Legitimacy

)而使法國轉危爲安，加富爾 Cavour 以縱橫捭闔之手腕，使意大利轉弱爲強。近如德已故外交總長史特萊斯曼 Stresemann，戰後能以容忍果敢，不顧國人誤解之精神，在力主和平與法合作之政策下恢復了德國在國際間已失去之平等地位，更如捷克之班尼斯(Benes)，不以其代表一弱小國家，而在歐洲政治舞台上減失其重要性。凡此，都足以證明外交家的產生，不必限於強國；其不產生，亦未盡是由於國家衰弱，是外交家之有與無，必定還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廣義一點的去看這個名詞，外交家可以分作幾種：深謀遠慮，洞察世界大勢，內足以支配國內的政治，外足以利用國際環境，縱橫捭闔，運籌帷幄，立國策，定戰略，使國家轉危爲安，轉敗爲強。比如稱霸一世的拿破倫，鐵血宰相比斯麥，復興土爾其的凱木爾，統一意大利的加富爾，聖神同盟的主角馬特泥，倡法統主義的台列蘭，維新日本的伊藤博文，和歐戰期間的「老虎」克勒孟梭等等，都可以稱作第一流的外交家。日本學者石井菊次郎曾以『經綸』派來形容這一派的外交家。其次：機警過人，臨機應變，以敏捷之手腕，動人之口舌，根據既定的政策，折衝於國際政治之中，在消極方面，能夠變仇讐爲友好，化干戈爲玉帛，發現國際間的陰謀，離間仇國與他國的感情；在積極方面，能夠敏捷的促成本國既定政策的實現，打破本國外交上之障礙。比如歐戰期間的『和平使者』白里安，戰後爲德國打開僵局的斯特萊斯曼，美國經濟恐慌期中的『超然大使』德位思，當今出名的英國『青年外交家』艾登等，都可以稱作第二流的外交家。亦即石井菊次郎所謂之『折衝派』的外交家。再次：老成鍊達，粗諳國際大勢，深明國際儀節，循軌蹈距，講信修睦，凡事顧到大體，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世界各國大多數的外交官，都屬於這一類，這種第三流的外交家，我們可以稱之爲『平庸』派的外交家。更等而下之，則既無學識，又無經驗，以特殊關係，出膺外交上之要職，上焉者，對於應付外務心雖有餘而力實不足，下焉者，視外交如兒戲，輕舉妄動，遺笑大方，辱國辱己，習以爲常，這一流的外交家，各國皆有，而中國獨多。這種四流的角色，我們可以稱之爲辱國派的外交家。最後，有相當的才幹與經驗，身當外交之害爲前提，媚外取巧，假外人以自重，遇到緊急關頭，不

是喪權，便是辱國，好比我們中國的曹汝霖章宗相陸宗輿等，都可以稱作外交家的最下流，俗名之爲「賣國賊」。

歷史上第一流的外交家，多半爲其本國政治上的領袖人物，他們產生，一面要靠政治上的自然演化，一面要靠他們個人的人格與奮鬥，他們多半是在「英雄造時勢」和「時勢造英雄」的兩種現象中自然而然的產生出來的，並非行政訓練所能爲力的。二三流的外交家，雖然也要靠他們個人的才具與奮鬥，但是他們的成就則半要靠環境與培養，換言之，這流的人物，是可以由人工訓練而成的。

至於所謂四五流的外交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製造他們，他們的產生固然也是他們自己「奮鬥」的結果，然而一個國家要想避免這類人物的產生，是可以用行政的方法做到的。所以說，第一流的外交家，我們祇有靠上天降生給我們，不是我們人工所能造就出來的，我們人工所能夠力的，祇能去造就那二三流的和避免那四五流的人物。老實說，我們中國今日不必好高騖遠，如果能夠多造就出幾個二三流的人物來同時並能避免產生那四五流的人物，已可算是很大的進步了。

要想對這個方向去作，吾人首當對目前外交人事行政

有個明瞭的認識。簡單說，目前外交人事行政的根本弱點至少有三個：（一）政治任命太多，而對於政治任命又缺乏一種比較客觀的標準。（二）外交行政至今未能制度化，而已有的任用準標，未能切實執行，因此缺少一種專業化的外交人事結構。（三）考試制度不健全，而推行亦不力。關於第一點，其構成之最大原因是由於當局者對於「政治任命」之認識不夠清楚。第二點是組織與訓練的問題，第三點是政策與技術的問題。後兩點都比較專門些，留待專文來討論，本文祇限於討論「政治任命」一點。

爲討論便利，我們不妨將外交歷史的演進，根據牠的推動重心粗粗的分成三個時期：（一）宮廷外交時期（二）官僚外交時期（三）國家外交時期。在這三個不同的時期中，外交官的「政治任命」也隨着發生不同的意義。宮廷外交是以君主爲中心，宮廷爲對象，因此，駐外使節的人選，不論是臨時的或是常久的，都要以能代表君主個人爲先決條件。同時因他要出入於外國宮廷皇室之間，對於宮廷中的禮節儀式，必須明瞭熟習，方不致有損君主的體面。「出身」「爵位」和「財產」是當時所最注意的幾件事。而能夠合乎這些條件的人，自然以皇親國舅貴胄世家最爲適宜

。因此，在此時的「政治任命」，多半是限於貴族階級，不但是正式使節本人，即他的隨從也多是出自同一階級。這種貴族式的「政治任命」在英國的根基打得最深，英國的外交界至今尚有階級包辦的嫌疑。自然，現在的英國外交界已不是真正的貴族包辦，然而英人傳統所提倡的「紳士」式的外交家，至今仍成風氣，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在英國外交界中，十成的貴族包辦是沒有了，而八成的『牛津』『劍橋』階級包辦，却是事實。此外，英國外交官的任用，素有財產上的限制，（每年須有四百鎊收入者）直至晚近，尚在實行，這也是貴族式的「政治任命」之遺跡。

國際關係日趨複雜，宮廷外交應付不了各種的問題，同時各國政體相繼變更，宮廷政治隨着君主政治而俱去，國際政治於是演進到第二個階段，我們可暫稱之為「官僚外交」時期（此名詞尚待斟酌）。在這個時期內，政治上發生了兩種特殊的現象，一即各國都有政黨興起，而由政黨政治產生了所謂之「分贓制度」（*Spoils System*）；一即國際關係日趨複雜，國際公法漸成爲國際交涉之依據，使國際交涉日見專門化。「分贓制度」，簡單說，就是

以官吏的位置酬報那些爲政黨效勞的人。爲黨奔走活動和解囊捐助，都算爲黨效勞，因此，「分贓制度」應用到外交上去，便是以外交官的位置來作這類酬勞品。「分贓制度」在美國的基礎打得最深，美國的外交界至今尚有「分贓」的遺風。美國外交界的政治任命以下列幾種人爲最多

(一) 落選的議員 (二) 捐助黨費最多的黨員 (三) 有功於黨的政客官僚或在其他職業比較有名望的人。經過多少年的吏治改革運動，「分贓制度」才算漸漸的脫離開美國政治的核心，然而，直到如今，還有一條不成文法在那裏運用着，即凡每一個新選總統就職的時候，一切的大使公使都要循例的呈請辭職，自然，總統對於這類的辭職未必完全接收，不過這種表示終究可以給大總統保留着一個「分贓式」的政治任命權利。習慣雖然如此，而總統對於那些有成績有資格的外交官則往往重新加以任命。同時對於新的任命，雖然仍是政治性質的，但其標準已漸漸偏重於「人才」「能力」等等條件。好比現任的美國駐俄大使德位恩氏（Joe Davies）他之任命，有一部份原因是因爲他曾捐助民主黨一萬七千五百金元作羅斯福競選活動費，但並非完全以此原因，因爲，與他競爭作駐俄大使的保克氏（

Curtis Bok) 曾捐助過三萬美金的數目。所以說，這種政治任命，捐助黨費雖然是任命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這多少可以代表美國政治任命的趨勢。

此外，在同一時期內，因為有國際交涉日趨專門化的現象，無形中也多少的變更了政治任命的性質。在「分贓制度」下自然很難養成一種「專業化」的外交人事結構，因此每一個外交官為行使職權的便利，往往以自己為中心養成一般幹部人員。這種關係有的時候是以家庭為中心，即盡量培養引用自己的子弟親屬；有的是以過去作事的關係為中心，盡量培養引用過去的部屬。這種習慣，漸次的推廣了政治任命的範圍，不過，這種「官僚式」的外交行政，因為「分贓式」的政治任命尚存在，皆有「五日京兆」的危險，本身即難以專門化以應付國際間專門化的需求。這種現象，乃是激起各國向着外交「專業化」的方向邁進的動因。

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的國際關係更趨複雜，國際交涉已進入第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稱之為「國家外交」時期。在這時期中，外交雖然仍是以政治為輪廓，但是以經濟為基礎。在這時期中的「政治任命」是以能代表國家利益為先決

決條件。因此，各國所派出的外交官，多半趨重於那些真正在國內政治上經濟上或社會上握有勢力的人，而各國所歡迎接受的外國外交官也是這一類的人。好比在幾年前蘇俄派了外交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名洛司斯坦因 (Rothstein) 任駐意大利大使，為義國拒絕，當時駐俄的義大使通知齊吉林的理由是：「義大利不願意接受一位在外委會沒有權力的人」。他如英國所歡迎接受的美國外交官是真能代表美國的資本家的人，或是美國所歡迎接受的英國外交官是真能在國會內佔重要地位的人物。特別在歐戰以後，各國的「政治任命」都很顯着的偏重於實力派的代表，而這類實力派，無論是實業家或政治家，都是以能代表國家某個利益的人為最理想。「國家外交」時期雖正在開展着，而我們已很可以看出牠的中心趨勢是如此。

不過，在這個中心的潮流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另外幾種趨勢來：

(一) 以整個的外交人員行政作為對象來看，各國的趨勢是：純粹依「政治」任命的人員數目日日減少，而以促成「外交專業化」的方式而任命的人員數目日日擴大。

(二)受「政治任命」的外交人員本身也漸趨「專業化」，即各國政府都願意保留那些有資格與成績的老外交官。

(三)「政治任命」的對象是那些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或其他職業中有地位的人，換言之，「政治任命」是要任命那些——無論在那種職業——已經比較有成就的人，絕不是那些在社會上任何職業中已經失敗了的人。

根據以上的討論來觀察吾國的現狀，我們可以很坦白的說，我們雖立國於廿世紀的『國家外交』時期，而『政治任命』的性質與標準，仍脫不了『宮廷外交』與『官僚外交』時期的色彩。在條文上，關於外交人員之任命雖有種種規定，而在運用上，仍究離不開私人關係與『分贊』原則兩個標準。原則上，『政治任命』雖僅限於大使公使，而實際上整個外交人事之結構，自上至下，都可以用『政治任命』而解體或變動其內容。即就大使公使的政治任命而言，亦復缺乏『國家外交』時期之真確認識。就這幾年來的『政治任命』來看，下台的軍閥政客有日見增多的趨勢。這類人多半都是徐維德氏所謂之『國內所不需要的

人』，放開客觀的環境來批評，他們都是些不學無術的『門外漢』，他們不但對於國際政治法律的常識缺乏，即對於自身的修養操持，都多成問題。將這種社會上的『失敗者』送到外國去，即在平時已要大鬧笑話，何況處此國難當前，危急存亡的關頭，其影響於國家的外交前途，更可想而知！除了這類人以外，在這幾年的任命中，我們還看到一些在政治思想上或政策上表示過特別愛好的人，好比將表示與某國政治同情的人送到某國作大使或公使，細查派遣當局的本意必以為這種人必受該國格外歡迎些，從此外交交涉可以順利些，其實這只是一種膚淺的希望。在事實上，人家外國無論是採行那種政治的國家所希望於我們的，是真正能夠代表吾國利益的人物，至於他是否贊成人家國家的政治思想則並不特別注重。自然人家不歡迎別國的外交官對本國的政治作不利的宣傳，但同時人家也並不特別希望咱們的外交官去為他們作政治宣傳。所以說，對於這類任命亦當特別小心，特別在吾國政治未上正軌，國際間政治思想極端複雜的時候，偶一不慎，難說我們的外交官在實際上不會變成駐在國的宣傳者，假若中國的外交官都變成這種人物，那豈不要活活的把中國瓜分了！最近

還有一種現象，就是派遣所謂「學者」出身的人物作外交官。從客觀的立場上說，這總算一種進步的現象，因為有專門教育的基礎，總比無教育基礎好得多；不過，如果外交官祇有教育基礎而無經驗或其他條件（如前邊提及在國家外交時期所應俱之特質）還是不容易作得出成績來的。

總而言之，吾國處此「國家外交」的新時代中，即當認清「國家外交」的基本精神；外交上的「政治任命」在目前任何國家中都還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則吾人所當

努力的當在善於利用此種「政治任命」使其盡量的合乎「國家外交」的基本條件。為謀整個的外交人員行政結構之改進，我們同時希望吾國的「政治任命」的範圍日見縮小與整個的人事結構日趨「專業化」，在此國難當前的非常時期中，我們最低希望當局能祇將那些「外國需要的」人送到外國去，對於那些「國內所不需要」的人還是留在家裏好。

（張匯文）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從 提 搞 說 到 抗 戰

有眼光的人都這樣說：中日兩國應當是兄弟親善之邦

。第一、中日兩國同文同種。第二、地理上兩國非常接近，長崎與上海間的距離不過四七〇浬，比中國邊遠省區，還便利密切得多。第三、兩國經濟上的互相調劑。日本名記者太田宇之助說：「中國國民經濟生活安定，國民之購買力增大，則受其利益之外國，當然為隣邦之日本。」去年由一月到十月，依海關的統計，日本對華的貿易居第一位，而走私尚未計算入內！則日本在中國所得經濟上的利益之巨，不難想見。中國愈安定，日本貿易額愈將增巨

，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實。同時中國是工業落後的國家，事實上亟需現代化、工業化，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日本以上述兩種優越地位，給與幫助是相當便利的。這樣，兩國間交換其特殊的產物，彼此兩利，造福兩國國民，實非淺鮮。反之，日本不戢其侵略的野心，中國一般的愛國心高張，日本的貨物被抵制，貿易經濟上必遭嚴重的打擊，由已往事實觀之，即可知道。第四、國際上的關係：中日間假如能真誠合作，不但可以排除白色人種的侵略，同時可以保障東亞各國的和平及福利；即於太平洋集體的安全以

至世界和平，亦有莫大關係。由上述幾點簡略的理由看來，中日間的親善以至提攜應當是必要的。孫中山先生過日本神戶時曾經說過，「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應該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這話是很確切的。

但是，中日間的親善以至提攜，雖有其必要性，而從種種方面觀察，實際上有種種的不可能。其一、中日提攜最大的障礙是日本不放棄其在中國已攫得的利益。在外交的原則上講，兩國之間，如果要親善以至提攜，必以平等互惠為基點。自九一八事變以還，日本既強佔我東北四省，進而組織冀察偽自治，覬覦綏遠；提出「共同防共」「華北特殊化」等等難以忍受的條款，同時更武力保護大批的走私；對於我國領土的完整，自主的權利，經濟的利益等等，損害無遺！在此種情形下，除了甘願作亡國奴的人而外，還有什麼真正提攜的可言！要談提攜，日本必先要以平等待我，還我領土，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和待遇，方有可能。但是，這不啻與虎謀皮，日本在中國已攫得的利益，無論如何，在一貫侵畧的主張下，除了她武力統治的崩潰外，是絕不肯放棄的，其二、偏謬教育的結果。在

日本人中，自不乏明達之士，不應侵略中國，而應幫助中國的這種卓見和呼聲，也常常可以聽到。但是，多數的人常常是謬誤的！一般人從小就受了一種偏謬的教育：鄙視中國人，以為中國是應當給日本統治的，中國的富庶的出產，是應當讓日本人來享受的。一方面受了狹隘的愛國思想的陶冶，結果，對於中國處處肆其侵略，心目中存了一種不平等待遇中國人的根本信念。自然，真誠的提攜是談不上了。不惟如此，因為這種信念之實現化，激起民族間的惡感甚深。中國為抵抗此種侵略計，自然生出一種反抗仇視的心理。日本的侵略壓迫，一日不解除，中國人的反抗仇視，也一日不能消泯。日本單要求中國政府取締抗日運動而不反躬自問；則抗日運動即令表面平靜，而暗中更將激烈的滋長蔓延的。民族間的仇視難除，兩國間是不能握手的。第三、自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日軍皆獲得勝利以後，軍人的氣焰逐漸高張，時至今日，實際上的政權已操諸軍部少壯派之手。會議制度，徒擁虛名，民主政治已老重臣之被戕害及其他事變，已可明瞭。軍人派一貫主張以武力侵略他國，以求發展。環觀日本隣邦，美國遠隔大

洋，非日本勢力所能及；蘇俄自五年計劃成功後，實力不可侮，日亦不敢貿然挑戰。惟中國擾攘多年，國勢積弱，日本早已垂涎，甚至視為生命線。在「政治向弱的方面發展」的口號下，日本是不肯改變其武力的侵略主義的。即引起世界戰爭，似亦不辭。此種大陸西進政策既不能改變，自然絕不會產生提攜的事實。

綜上數端，中日提攜的路途上，是佈着不可拔除的荆棘，不可排開的障礙，而不能通行的！兩國間既渺妥恰之可能，則此後的局勢將如何的開展？現在且分兩方面來觀察：

第一、由政治以至軍事的方面來說：目下國際間的糾紛是非常複雜的。推其原由，不外帝國主義間互相衝突；帝國主義國家與蘇聯的鬥爭；殖民地的爭奪戰等等，造成了難以解除的危機。而且此種危機日愈深刻化。一九三六年雖已平安渡過，而瞻望前途，仍時時有大戰暴發的危險。爲應付此種難關，列強莫不努力於軍備的擴張。日本則更極積：去年海軍預備會議的無結果及日本通告華盛頓條約的廢止，退出國聯生效而繼續佔據委任統治羣島等等事件，莫不使日本以其全力準備。同時，英國在新加坡建築之

軍港，預計三數年後，即可完成。美國的軍備和蘇俄第二

次五年計劃，亦將於一九三九年完成。爲了與英國在遠東競爭，爲了與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爭霸，爲了向蘇俄進攻種種原因的刺激，日本爲地勢物質所限制，勢必加緊對於中國侵略，以圖達到其政治的乃至軍事的勢力的極積膨脹。

第二、經濟的關係。日本爲攫取中國的資源而積極的侵略中國自不必說。即由日本國的經濟狀況來觀察，此後亦將加緊其侵略。自世界普遍的經濟恐慌以來，日本亦籠罩於不景氣之中。九一八事變之次年，日本經濟情況好轉

，工業增加，利潤加大，貿易增多；然一考其內容，仍有甚深之矛盾。蓋新的資本並未增加，增加者不過軍事工業和輸出品二業。軍事工業的增加恃巨額的軍事費的潤澤；輸出品的繁榮乃因日圓貶價與社會傾銷所促成。軍事工業的生產，除了戰時，平時其價值不能取償，輸出工業品的價值雖可取償，而其大部分因廉價傾銷的結果，犧牲於他國之購客。同時，資本的利潤加大，即加重本國一般消費

者及農民的負擔，使一般人的生活日愈窮困。且貿易上輸出雖然增多，入超仍然甚巨。財政上的赤字依然膨大，外債額且達一九二六年之二倍。基上種種事實，其恐慌之

程度可謂甚深。爲解除此種經濟恐慌的有效辦法，不外擴大國外的市場，即擴大集團經濟，以生產品向外國傾銷。

或是實行武力政策，以實現其軍事工業之價值；一則軍事工業可以繼續發展，二則可以使一般人在愛國的美名下，忍受一切生活上的痛苦和負擔。中國一方是日本的大市場，一方又是日本武力發展的好環境，所以日本在經濟上越恐懼，其對於中國的侵略也越極積。

如上所述，中日間不特無提攜之可能，且此後日本的侵略更將加緊！俎上魚肉的中國，亡國之禍已燃於眉睫。

在此風雨飄搖的險惡環境中，唯一的光明的路只有一條；抱着犧牲的決心與敵人作生死存亡的抗戰！唯有在死中才能求活，惟有流血才能解除一切的壓迫！犧牲雖然慘烈，流血雖然痛苦，然其所得代價，却是絕對的偉大和光榮！「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的因循苟安辦法，只有自趨於滅亡。歷史上儘多弱者戰勝強權的例證，惟視其決心之如何耳。遠的不必談，一九二五年法蘭西與西班牙的聯軍進攻北非摩洛哥的里夫卡別爾族，以法蘭西陸軍之優秀，且有西班牙之助力，戰爭且延長至數年。阿比西尼亞以軍事準備薄的弱小國，抵抗動員數十萬最新銳的意軍，達

八閱月之久。蕞爾之國尚且如此，何況中國？且中國並非絕對的弱，日本亦非絕對的強。古云：「兵哀者勝」！中

華民族，久受侵略與壓迫，在未來的戰爭中，必能奮勇爭先，殺敵致果。前此一二八之役，最近綏遠之抗戰，吾人已可觇知此種忠勇奮發之精神。以上係縱的觀察，再從橫的方面觀之：軍事上，日軍動員最多可以達到五百萬，中國則幾可十倍之。日軍雖較新銳，而作戰的實地經驗及不耐勞苦則不及中國。矧中國之以生死關頭必作殊死戰乎？同時日軍雖可攻佔中國沿海重要都市，中國可以堅壁清野，步步抗戰及游擊的策略牽制之。戰事既延長，日軍必疲於奔命，非利圖也。且日本在遠東最大的敵人尚有蘇俄，其次則英美等衝突亦甚。日本爲防禦計，勢不能以全力與中國搏戰，而使他人乘虛以入。故日本所切盼者，實在「以華制華」，或是虛聲恫嚇，以使中國帖然就範。若中國有犧牲決心，準備抗戰到底，則日本實未敢輕視，亦非其所願也。從經濟上講，一經開戰，日本之生產工業，勢必一落千丈，一則在中國無銷場，二則其力量將集中於軍事工業方面。結果，一般人之生活日陷苦境，雖愛國美名可以麻醉此種痛苦，然決不能持久。同時中國只須設法斷絕

其原料品如煤鐵等之供給，日本經濟工業，亦將難以維持。德國在前次大戰中之失敗，非全爲軍事之敗衄，經濟崩潰，軍需品缺乏，蓋爲其主因。至於中國資本尚未完全集

中都市，尙停滯於農業手工業階段，一般人生活簡單，戰時即遭敵人經濟之封鎖，尙可自給。同時，軍需品之供給，即較缺乏，在刻苦激勵之下，並不會影響士氣。戰爭一延長，日本的經濟必先崩潰也。再看國際方面：日本在太

平洋上是孤立的。日本勢力越膨脹，引起英美的不安和利益上衝突越甚，蘇俄的感到威脅也越切。最近的日德日意協定，雖然於日本有利，而引起英美的猜忌甚深。中日一經開戰，英美蘇俄雖非助中國，而實際上亦難坐視。最底

限度亦必予以輿論的以至經濟上的制裁。中國雖不能恃此種外力之援助，然利用此種情勢，運以適當的外交，亦屬有利。

總之，今日中國國難自極嚴重，解救之道，唯有抱犧牲之決心，作抗戰的準備，必要時與敵人作殊死戰。爲民族生存計，爲國家生存計，均必以抗戰爲唯一解救之途徑！

上下一致，精誠團體，決心犧牲，努力殺敵：中華民

族必能復興！必有其偉大燦爛的將來！

(于西華) 二六，一，三十。

中國工業化中之勞力問題

中國素以地廣人多馳名於世。自與西方文化積極接觸

以後，中國工業化遂於一八六〇年開始，而迅速發展於歐

戰期內。迄於現在，一方因新式工廠之日增，而新式廠工

之需要日切；他方面因機械之採用日廣，而勞力之需要日微。在此兩種情勢並存之下，如何利用中國大量人口之勞

(甲) 勞工之源泉

中國現有之勞力，除農民外，尙有工廠工人、手藝工人、礦工、苦力及農業工人（即雇農與農場小工等）等均

有二〇〇〇二五六人，惟此次調查並未包括東三省廣西四川福建及西北邊疆諸省。除西北邊疆諸省幾乎全無新式工廠外，東三省有廠工九六八〇二人，四川三三五八人，福建二〇、七九九人，廣西四四八人。故若合併此數省之廠

工業化進展之主要勞力來源。

工廠工人之數量，據實業部一九三三年調查，全國計工數於上述數字內，則中國全國之廠工，至少有二百一十五萬人。就手工業工人言，中國工業化既尚幼稚，則在國內手藝工人之數目自必遠超過廠工數，亦殊無疑問。惟從來並無關於手藝工人之大規模調查，故全國手藝工人之實數不可知。據前農商部估計此種工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五，馬超俊氏以城市人口為根據，估計占百分之二，則是由全國人口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推算，全國手藝工人數當在六、四五〇、〇〇〇至八、六〇〇、〇〇〇之間。

中國礦業雖不發達，但採用土法開採之小礦公司，仍

偏於全國。托格色夫(Boris P. Torgashoff)，根據中國之人口及礦工勞動效率推算，全國礦工人數最多有二、二五〇、〇〇〇人，最少亦有一、八〇〇、〇〇〇人。陳達佑

計與此類似，認為從事於土礦半新式礦及新式礦中之工人，約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其中百分之六十受雇於土礦，百分之四十受雇於半新式及新式礦。礦工大半為無技工人或略知技術之工人，至於有技工人僅有百分之三。

交通運輸工人，在交通工具不發達之中國，為數自然很多。前日本派員在中國調查之結果，估計交通工人約占全人口百分之八，是即有三四、四〇〇、〇〇〇人。今據所知全國鐵路工人約八二、〇〇〇人，郵務工人二六、〇〇〇人，電務工人四、〇〇〇人，其他大約均係車夫轎夫，碼頭夫及各種苦力，大都係完全無技者。

此外尚有一種農業工人，散佈於各地農村中受雇於農民從事種種工件者。據巴克(Buck)之研究，中國農場勞力，有五分之一來自此種工人，則可假定農業人口中，約有五分之一屬於此種工人。按中國農業人口估計約占百分之七十五，則農業工人數全國約有六四、〇〇〇、〇〇〇人之譜。

數百分之一。是即上述各種工人之分佈於農村者有百分之七十，而分佈於礦場及城市中者只百分之三十。故就勞動來源方面視之，為量殊不缺乏；而將來工業化進展後，勞力之必由農村移出，亦勢所必然。

(乙) 目前勞力過剩現象

(一) 新式工業之遲滯 因國內農村日趨破產而國內復于一九二九年後受經濟恐慌之影響，一般中外人民之購買力均顯暴縮。在國際貿易方面，中國輸出與輸入均大減少，而國內新興工業之受打擊可以想見。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製之國貨工業營業指數觀之，中國工業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除少數工業如火柴油漆熱水瓶製造諸業外，重要工業如棉紡、染織、棉織、毛織、絲織、綢粉、針織、捲煙橡膠機器等業，均呈年不如年之象。一九三四年下季以後，雖棉紡麵粉等業，一九三五年內如縷絲業，略具復興之象，其他如火柴捲煙絲織機器等業仍凋敝如甚。一九三六年雖倒閉之風漸遏，但投資創廠仍不活躍，是以只能使失業不再嚴重化，不能刺激雇用之增加。則是數年來因經濟凋敝之失業者，依然失業。

(二) 手藝工業之淘汰 年來中國新式工業於未見激增

，惟外國機器製造之各種工藝品則日愈深入農村，尤以日本貨之賤價傾銷，中國新式工業固因之而難進展，即手藝工業亦因之日愈崩潰；再若人民習慣之變遷，愈使土貨難於推銷。此等原因遂使中國手藝工人之失業者比比皆是。

最要者如：南京之綵業，因國內上流人士而今喜用毛織品及外貨，以致失業者十餘萬；江西之瓷業久已馳名全世界者，竟因不知改善而受日瓷之傾銷，以致工人人數由昔之二十萬而減至今之四萬；廣東石灣潮州一帶之陶器業久為南洋各地華僑所樂購，今則因一般華僑購買力減縮，日瓷又復傾入南洋市場，以致窯戶陸續倒閉，因此而失業之工人，亦達三萬有餘；土布之銷場，向以國內農民為對象，今因一方面農民貧困無力，他方面機布價廉物美，深入農村，報載華南該業工人之失業者，數達三十萬，又如土製火柴素為中國內地人民所習用者，亦因中外機製火柴廠之出品，藉年來交通之發展而深入腹地，致使業士製火柴者不得不虧蝕倒閉，而兩廣一地此類失業工人，無慮一十五萬；地氈業素為平津一帶手工業中重要出產，而今亦因歐美已有機製地氈，價格特廉，值茲世界不景之際，最易銷售，因而中國地氈業逐漸淘汰；他如廣東四川山東等地之手

工織絲業，華北之手織布業等莫不遭遇同一之命運。

(三)交通進步後之苦力及運輸工人 中國交通不便素為人所宿知，雖於接受西方文化後而興築公路鐵路，提倡航業等，但數十年因內戰頻仍迄少進展。是以一般人民之交通工具，大多以人力轎及帆船為主，而運輸在內地則全賴苦力及小船。至于較大之都市中，莫不見人力車夫及苦力之充斥。乃至國民政府建奠以來，積極發展交通，改良航業，最近數年尤非突猛進。言通車之公路，則由一九一九年之一八五公里進而為一九三五年之二二八、五〇〇

(四)農民離村 中國勞力之源泉，除上述者外，大部潛蓄於農村中，是以農民人口之變動，實於勞動市場之供求關係有舉足輕重之勢。年來因災患不絕，離村遂成一二、三〇〇公里，而一九三五年六月，調查雖僅增為一三、八〇〇里，惟一九三五年一年間中央及地方政府與商家預定建築之二五〇〇公里，截至年底即完成五分之三。今若同蒲浙贛等線之完成，隴海線之展築，粵漢線之通車，均為中國最大之鐵路幹脈。陸上交通與運輸之近年突進，一般可見。然而平素仰賴為旅客雇用之轎夫苦力，莫不因此而陷於失業之苦境。即以都市而論，多數地方均因公

活。在航業方面，近年亦大加整頓，雖船舶總噸數增加有限，舊式帆船亦可供運輸連絡，惟若財政部之於兩淮鹽運，改帆運為輪運，此一事件，即使失業而集中江蘇十二圩一帶之船工達二十五萬人。至於因公路鐵路之通車，捨航行或船運而改為車行輪運者，更使一般船工有欲生不得之苦，是以中國交通運輸方面更加進步，則業交通運輸為生活的一般苦力，失業必愈滋多。此亦中國工業進展後所不可免之現象也。

離村之原因雖有多種，如人口增加，天災、兵禍、稅租等，但「災荒之國」(Land of Famine)之中國，實以天災之頻仍為其要因。金陵大學曾調查一九三一年來水災區內之住民，其報告中謂有百分之四十均逃亡他處。逃亡而獲工作者有三分之一，行乞度日者有五分之一，其他均未得工作或不知下落。

共汽車搬場載重汽車之逐漸舉辦，車夫苦力亦不易謀得生

即在無災荒之區域，農民離村亦為極普遍之現象。陳

翰笙研究廣東十六縣農村，其報告中謂：

「近五年來，富農和中農的戶數減少，而貧農的戶數同時增加。貧農數量增多了，他們獲得生存的機會更是困難。他們為求雇農而不可得的時候，只有純粹的脫離了耕作而專去當苦工、小兵、小販或小店員。因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為甚麼非農民非地主的村戶中有十分之七以上操着這些職業。」

日人田中忠夫亦曾於未受災荒之區域中，擇出幾縣研究其離村率，如江蘇之儀徵江陰與吳江、安徽之宿縣、山東之嘉祥河北之遵化唐縣邯鄲與鹽山、浙江之蕭山等，離村率最大者達百分之八、七二（鹽山），最小者百分之一、四四（儀徵），而以百分之四上下為常見。另如河南省之許昌輝縣鎮平等縣亦經人研究，其離村率乃見增加。在一九二八年許昌離村率為百分之七、〇，而一九三三年增為百分之八、六，輝縣由百分之二、三增為百分之五、四，鎮平百分之七、五增為百分之十二、二。

是以中國農民離村有其必然之趨勢，不過天災尤為最要之原動力。

農民一經離開土地以後，即無所用其農業技術，是以

在城市勞動市場中，特別與無技工人及苦力發生激烈之職業競爭，人力車夫在中國各都市成一重要問題，即因此故而不須十分技術之工業廠主，亦喜雇用此輩由農村出來之工人，以其體質既較都市工人為健壯，且性情純厚而易於管理，至於彼輩因生活之簡單能安於較低之工資，亦一因也。工業勞動市場因有此輩離村之工人陸續加入競爭，故在工業發展遲滯勞力需要未增之際，供求關係大失調節，而勞工生活遂愈不堪。

(五)失業估計 上述各種原因，形成目前中國之廣大失業現象。惟究失業嚴重性果至如何程度，因素來中國無是項統計，故難確言。去年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曾對此問題作一嘗試的研究。在其研究範圍內，因農業人口具有特殊性質，並未包括在內，而邊疆鄙地材料無法搜集者亦除開未計。結果此次估計所包括之區域，僅含職業人口（農業人口除外）三千萬。據估計此三千萬人口中失業者有六百萬，是即成五與一之比。設此種估計可靠，則目前中國失業總數，殊可驚人。

(六)人口之增加 此外在勞動市場中影響勞力之供給方面者，尚有人口增加一因素。

中國人素以多子爲多福，是以對於生育向來自然。同時，因天災兵禍之連年，衛生方法之疏忽，死亡率亦甚高。雖在此種天然淘汰積極流行之下，中國之人口仍尚有增加。據陳達之估計，中國人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間之生育率爲三八，死亡率爲三三，自然增加率爲千分之五，因此每一百三十八年中國人口增加一倍，較之德意志英吉利愛爾蘭瑞典奧地利法蘭西諸國人口之增加尤速，而與蘇格蘭及比利時之人口增加速率相將（註三一）苟此後仍照此率增加，則每年增加之人口至少在二百萬人以上，此亦對於將來勞動市場之勞力供給方面，實有極大之影響，固不待言。

（七）工業化進展後勞力供給不成問題 綜以上所述，可見中國勞力來源之衆多。以過去七十餘年工業化之結果，工廠吸收之人口不過二百數十萬，則將來中國工業化無論如何進展，在勞動數量之供給方面，不僅絕無問題，且恐有供過於求之虞也。

（丙）中國工業化進展趨勢下需要之勞工
（一）中國工業化之進展趨勢 一國工業化之途徑，頗受天然富源之限制。天然富源之與工業化發生密切關係者

，莫如礦產與水力。水力素有「白煤」之稱，可以補煤藏之不足。中國之水力，居全世之第四位，不可謂不足。最大之水力，在長江三峽西江伏波灘及黃河龍門等處。今雖已被开发利用者甚少，然而前途則頗有希望。至於礦產，

以煤礦最富，惜多集中於山西陝西交通不便之地，以致多未開採。鐵礦則中國非常缺乏，僅占世界總儲量千分之六，兼之鐵苗占全國總蓄量五分之四現時產量居國內第一位之遼寧省，而今已陷於日人手中，其餘五分之一，多分佈於長江下游諸省與產煤之山西陝西相距過遠，開採提煉殊不經濟石油儲量亦微，僅占全世界十五分之一，亦偏在西北諸省，礦層不厚，不堪大規模之開採。以上三者乃近代工業國家之基本礦源，而煤鐵尤爲發展重工業之重要條件。今中國既寡於鐵，煤雖多而偏在無鐵之省份，以是重工業之發展，在中國之現在與將來，均恐希望甚少。

反之，在輕工業方面，因中國數千年以農業立國，人民習慣慣於紡織，綿絲棉花產量均富，近年絲業雖驟較微，但在出口貿易方面，其重要仍未見減低。而棉花產量愈見年增。按日下工業之發展情形，紡織業之重要，在國內各地與各業相較，均似有長足之發展，即在經濟衰落之最

近數年，中國紡織廠之開設，與紗錠布機之增加，反而蒸蒸日上，最近趨勢，已謀在內地發展。則在不久之將來，

工業化進展中紡織工業之捷足先登，殊可無疑。

是以中國工業化進展之自然趨勢，必重在輕工業方面，似為環境條件所決定矣。

(二)科學管理與機械化 此二者同為隨工業化進展之程度而增高。目前中國工廠中真真採用科學管理者，千不得一。惟機械之採用與增加，則頗明顯。據海關統計，最三年之機器進口價值，在一九三三年為四三、一七八、二四四元，一九三四年為五九、三〇六、三三八元，一九三五年為六五、八五三、二四八元。在濟濟凋敝之今日，尚獨如是，則今後更不待言。

(三)工業化進展後需要之勞工 吾人所注意者，即將來中國工業化後在機器利用普遍與科學管理流行兩種情形下需要何等之勞工。

按輕工業之工作性質，較為優柔少動，不須強大體力

，是以將來女工之需要，似乎將大大增加。此為應注意之點一。

管理科學化與生產機器化後之必然結果，即勞力需要之相對的減少，與工人技術程度之比較平均。關於前者，就上述勞動來源而論，則將來勞動市場數量方面之供求關係，實有另求調整之必要。關於後者則將來勞動市場質量方面之供求關係，亦須預防其供非所求。良以上述之各種勞力來源，以無技工人占有絕大之衆數，即極小部分之有技工人，其技術之應用是基於人力而非基於動力機器，故其習慣未必能適應工廠之工作。是以轉業之技術問題，實為應注意之點二。

是以我國工業化中之勞工問題，不在量而在質。關於質的問題，著者於「中國勞工之習慣體質與訓練」一文（載本刊第二十一期）中，已有較詳之討，故本文僅就量的方面略論如上。

(吳至信)

看了雷雨之後

雷雨在南京上演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這齣暴露家庭的罪惡的四幕悲劇在今日話劇草創的中國，總算有相當

的成功。有幾點還可以商量，提出來同愛好話劇的同志們討論。

雷雨幕幕動人，非常緊張，演員的配合都到好處，不能不佩服導演的努力。馬彥祥之飾魯貴，可稱入彀。有時微微有點過於滑稽，這固然能博得觀眾的一笑，對於繁漪或周萍不免噴賓奪主，而且對於一齣悲劇整個的情調不無妨礙。裘涼水之飾魯大海，蠻暴酷肖工人，惟對於他的父親一再以手鎗恫嚇，亦覺過火。萬家寶之飾周樸園，最爲傳神，當他回想三十年前的情景，對魯媽說：「無錫是一個好地方」那句話時，那種音調，那種神情，真耐人尋味。飾魯媽的于真如和飾四鳳的李萱也都令人滿意。繁漪遇人不淑，受周樸園種種的壓迫，可是飾者不能使她得着觀衆的同情。

說到劇本本身，我覺得在「準備」Preparation上尚有可以討論的地方。第二幕裏，侍萍回到三十年前遺棄她的周樸園家裏來，固已在第一幕開場魯貴與四鳳的談話中有了暗示，但是周樸園與侍萍的關係在第一幕裏沒有隻言半語道及，一直到第二幕周樸園見到魯媽，就是三十年前的侍萍——與她閒談時才慢慢地說出來，所以

在他們二人相遇而談話之前，魯媽初到周樸園家來看四鳳，目擊昔年的木器和自己在三十年前拍的照片，恍然大悟，暈倒在沙發上，這是非常緊張的一場，但是在觀眾看起來，有點突如其来，原因是在第一幕裏或在第二幕周樸園與魯媽談話之前缺少了「準備」。小仲馬說過：「戲劇的藝術就是準備的藝術」The art of the theatre is the art of Preparation。在Romeo and Juliet 悲劇裏，

莎翁將將二人情死的結局，早在guliet口中這樣說過：「I have no joy of this contract tonight; It is too rash, too unadvised, too sudden, Too like the lightning which does Cease to be Ere one can say it lightens.」這寥寥數行就暗示了Romoe與Juliet將來的悲劇，同時也足徵莎翁技巧之高明。

雷雨的結構有點依靠機會與巧合Chance and Coincidence。這不是說人生中沒有湊巧之事，人生中確有奇遇；可是一個作者爲了結構或佈局，特別製造機會與巧合來代替正常的和可能的發展，未免有點避難就易罷。雷雨裏「必須有的一場」The obligatory scene 就是周樸園看

出魯媽是他三十多年前遺棄了的侍萍，也是第二幕內很有一場。

魯媽何以會到周家來，這是因為她的女兒。

四鳳在周家爲僕，她的丈夫魯貴又在周家當差，而且她的兒子魯大海又在周樸園所開採的礦裏做工。因此周萍就子四鳳有發生肉體關係的機會——而且這就是周萍的父親三十年前所犯過的。但是周萍已與繼母繁漪有了愛情，這就形成戲劇批評家 Bruntiere 所謂「衝突」，整個悲劇便在這個衝突上開展出來。這些場合似乎太靠機會，太覺湊巧。

法國十九世紀戲劇家 A. E. Scribe(1791-1861) 編了不下四百種劇本，其中如 *Le mariaged' Argent*(金錢婚姻) *Le Verre d'Eau*(一杯水) 等當時聲名甚大，但是因為編劇的方法太巧妙，太機械，在文學上價值甚低。英國Hardy的小說其佈局專靠機會和巧合，因之人物反覆就佈局而失去生氣，已引起 E. m. Forster 的批評，(*Aspects of*

通 信 北 平 的 學 聯

北平的學聯現在好像是隻死老虎，它已被政府當局命令停止活動，死老虎是犯不着再打的了！但話雖這樣說，北平的學聯至今仍在暗中蠢蠢欲動，這隻老虎實際上並沒死盡！許多學生代表仍在說學聯叫我們罷課我們不得不

the Novel。本劇也有同病。

在中國這個時代，作者有魄力來寫這種悲劇，無疑的要受觀眾歡迎。雷雨的灰色人生觀爲西洋最澈底的自然派作品所不及。其中有的是主僕通姦，兄妹通姦，繼母同長子戀愛。這二者而有其一已足爲一個悲劇題材而有餘，今三者都出於一家，說句笑話，在最後一幕，響幾聲雷，死幾個人，還不足以打破沉悶，撥開陰霾，那所死氣凍凍的房屋也應該同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裏面所描寫的一樣，立刻傾覆，或者觸電火燒化爲灰燼，纔可掃盡膚氣。真的，雷雨裏周萍與繁漪神經失常，與坡 Poe 那篇名著中兩個神經病者相去亦不遠了。總之，我看了雷雨，印像是沉悶，沉悶，又沉悶；在世界大戲院裏幾乎與劇中人一樣喘不過氣來。現在雷雨已經過去，我盼望日出早些降臨。

(續)

罷課，「學聯叫我們怎樣，所以我們不得不怎樣……」，舊劇臺上有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正是這個道理。

北平的學聯始終是一個私生子，它是一種空氣嗅之不覺，聞之無昧，聽之無聲，却無所不在。我始終沒有能知道敵校學聯代表的姓名，別的學校也不曉得，學聯的會址更是無人能知道的了。據說在沒有代表前，學聯便已經存在，學聯之上大約還有一個什麼蘇維埃之類在指揮它，我們那些不知名的學生代表不過是虛應故事而已！學聯是我們的太上政府，它叫我們不要讀書，一天到晚喊口號，貼標語。我親耳聽見一個所謂「前進」教授講演過「罷課好比是糾察隊的棍子，我們要用它來作爲打倒資本主義的賣國政府的武器」感謝學聯！我們去年有大半年的光陰都做了「糾察隊的棍子」的犧牲品！

北平的學聯有幾套符咒，幾套法寶。眼法稍不高明，便會入了它的圈套。這些符咒，法寶遮蔽在一塊救國的大招牌下：什麼聯合各實力派抗日啦！及對一切內戰擁護張副司令救國主張啦！爭取愛國自由啦！居然吸引了許多意志薄弱的青年，跟着這些名詞跌滾打跑。在前頭搖旗吶喊的少數失意政客，和沒有資格做大學教授而實際上却混進

了大學的「符咒專家」，他們未始不知道那些名詞唱得幼稚可笑，但既可利用青年處，何妨利用之！他們利用人家來壁刀頭，自己穩穩坐得一個「革命」的頭銜，他們無論教經濟學也好，教政治學也好，教社會學也好，唯一的教科書是「辯證唯物論教程」之類。一郎當，二郎當，不佞雖然不文，大概一二個鐘頭准可把這套名詞背個爛熟！北平的學聯就是這樣一種人才，這樣麼一套符咒的結合，學聯的分子有一個特點是可以斷定的，他們的思想上都已有一層硬殼，任何教育不能損傷這硬殼分毫！他們是「職業的革命家」，他們專修的學程是罷課，罵人，唸咒！

西安叛變之翌日，北平學聯認爲是混水摸魚吃的機會來了，一般學聯分子莫不喜形於色，以爲國民政府的顛覆就在頃刻。他們處處替張，楊義務宣傳。宣言，傳單的荒謬出乎我們這批「落伍青年」的意料之外！但很欣幸的，西安事變只是一場短短的惡夢，蔣委員長終於平安返京，

所謂雙十二節只成了他們自己解嘲的謬語！學聯的西洋鏡在這次事變裏完全被人拆穿了，今後再也不能桶上招牌去

驕人！唉！救國！救國！多少人借汝之美名以惡行？！

（白文、二六、一、二三夜、故都殘冬）。

書評

大陸法在十九世紀之進步

The Progress of Continent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Various autho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8

十九世紀之科學發明與生產方法之革命，引起經濟生活之變動；經濟生活之變動，反映於法律之領域。法律爲社會現象之產物，具時間與空間性之特徵。十七世紀法國革命時代之法律，受當時社會哲學之影響，以古代自然法觀念爲其核心，提倡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此種個人主義之法律理論，實爲當時之環境產物。王權專橫，達於極點，人民之身分尊卑不一，產業之待遇，倚重倚輕，工商業之發展，阻礙橫生，苛捐雜稅，層出不窮，重商主義與保護理論，抑復助桀爲虐，頻增社會桎梏，故法律之個人主義，給予個人充分自由，以發展其天賦能力，實爲

對症下藥，醫治當時社會之最上理論。人民個人財產權乃爲法律之基礎，亦爲當時一班哲學家改組社會之理論。個人之生存，視爲與其同類不生何種關係，優游于自然環境中，獨享絕對之自由。人類之關係，完全由于個人意志自動的作用，初非有任何他種關係使之結合。個人在社會之生活，具唯一之重要性，因社會之最終目的爲個人。故個人之尊重與其財產之保護，不啻爲法律唯一的合理基礎，與立法之最終目的。法國十七世紀的法律，充滿唯理與唯心主義的色彩。

法國十八世紀之法律爲一停滯時代，無創造，無理想；對於前世紀法典之理論，只得其糟粕，未得其精髓，死守個人主義之成法，而社會之實際環境，與時代趨勢，早已轉變，割趾適履，只見徒勞無功。十八世紀之法國哲學

家，有其特殊之學術方法，嗜好邏輯，鄙視社會實際現象

之觀察，拒絕社會生活變動之合理的應付，因此輩哲學家認社會變動為一種錯誤，得嚴厲執行法律條文以補救之。

當時之法學家受此種哲學理論之影響，至為鉅大。十七世紀法國哲學之中心思想為個人主義，以匡救時弊，綜其造因，一由於哲理之追求，一由於政治與社會的需要。惟十八世紀之法國哲學家實背道而馳，他們理論的建立，既不應用理性（Reason），復不顧及社會與政治環境的需要，徒以經驗的觀點，期以實施于動態的人類。

法律理論之重大變化，起自十九世紀後半期。先是十八世紀之空前的經濟生活之變動，幾將舊有政治經濟組織全部推翻，同時因經濟變化所發生之政治與社會問題，至為嚴重，國際的與國內的實業競爭問題，勞工問題，階級鬭爭問題等；換言之，即廣義的社會問題，經濟發動所給予法律之影響，至為顯著：一為民法，範圍之擴張，不動產之發展，因信用制度之膨脹，幾為法典時代所夢想不到者；土地之商業化，使動產與不動產之界限，逐漸泯滅

。工業立法，實以產業權利較重于獨立之個人的權利，二為勞動立法之產生，在大規模生產的情況下，成千成萬的勞動者聚集于工廠，受利益相同的情緒驅使，他們的意志齊一，他們總覺得目下的經濟和法律組織，未能給予彼等以應得報酬。勞工對於社會現狀不滿的情緒，正如十七世紀時代的國民代表會議對於貴族特權的厭惡是同樣的。勞工為達到實現他們要的求起見，不是單獨和雇主交涉，而是採用集體行動；組織工會權利與罷工之認為合法，已足解放勞工，使其躋于社會階級之列，再進而組織政黨，將其要求與苦悶，陳訴于立法機關之前，以求得直。因此勞動立法，與時俱增；此種立法之產生，實由于新的社會情況之出現。

因現代經濟生活之變動，法律上之自由，契約，責任觀念，與財產之概念，均經發生極大之變化。過去之絕對私權觀念，現須受公共利益與社會義務之限制，對于此種變遷，本書言之綦詳，確實值得一讀。
（李子欣）

寄稿的人們

吳至信是一位很努力的青年社會學者，在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

工作有年。他以精透的學理參照宏富的經驗，來討論中國勞

工問題，自非紙上談兵的「專家」可比。

鑑清是一位文藝評論家，這次評論「雷雨」的文章真不愧為行

家語。

于西華女士分析中日問題有條不紊，後段提出應付國難的方針

，尤為一針見血。在舉國共赴國難的今日，于女士這篇文章

應該是俗雅共賞的。

白文是北平某大學的同學，在他寄來的「北平的學聯」後面會

聲明道：「敝人一向無黨派，除做書虫外不問政治。但敝人

却最痛恨世界上一切欺騙的勾當。北平學聯，其樹羊頭賣狗

肉久矣，是不可不戮破之，教教一般青白的青年，為我輩兒

孫積點福也。」

本刊第三十期內容

統一的建設

婚姻的代價

地中海協定與英國的苦悶

百病雜錄

偷渡人

通信：南京城內住的問題

書評：林參天的濃烟

何義均（一）
王政（四）

呂碩儒（四）

劉叔揚譯（七）
憂心居士（六）

安茹（三）

蘇茹（三）

刊例		旬刊	日報及公論	廣告	廣告費	非公論	是公論	刊例
目	價	地	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等第	特等
普通	優等	底封面之外面	底封面之裏面	六十元	四十五元	二十五元	正文	中間
(一) 廣告均為白底黑字，用與原地位同種之紙張排印。 (二) 銅鋅版自製，其委託本社代製者，須繪就圖樣，並詳細說明。 (三) 諸君查詢情形請向南京珠江路廿二號本社廣告股接洽。 (四) 欲知詳細版費，請向南京珠登廣告，須簽訂廣告契約。								
(一) 封面之裏面 (二) 底封面之裏面								
五十元 三十五元 十五元								

載轉許不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發行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印刷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二六九八

欲

知——當天正確消息

讀——生動雋永文字

閱——美麗清新報紙

京南
大夏
晚報

可滿尊意

定價：每月大洋四角

地址：碑亭巷十四號
電話：二三一二九號

華豐印刷鑄字所

最齊備之印刷材料工廠
承印中西書籍簿記表冊

第一支店
南京洪武路二二八號
鑄字部電話二三五二八
承印部電話二一九四八

發售
中西
銅模
鉛字
油墨
材料
卡片
印刷
機器

金城銀行

(民國六年創辦)

收足資本七百萬元 公積金三百四十二萬元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各種儲蓄

上海總行 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六九六九
資產總額一萬七千餘萬元

南京(辦事處)分行 白下路二三六

電話二二二八五
城北辦事處 四牌樓六五號

國內分行及辦事處共五十處
電話二二五五五

國外代理處 紐約 舊金山 倫敦 巴黎 柏林

東京 大阪
董事長兼總經理 周作民

各地電報掛號 華文均七〇〇七 英文KINCHEN

淮北新浦聚安鹽號廣告

本號在淮北經營鹽業歷有年所鑒於晒掃之法未臻至善運銷之道頗欠適宜因力遼明令提高鹽質務合衛生獨投鉅資廣置鹽田製晒務期改良產額尤貴充足取精用宏不遺餘力復於湘鄂贛皖豫蘇各省遍設分號每年銷額達百萬担固緣自產自運自銷乃能措置裕如推而裕國利民厚生亦即富強基礎久蒙各界讚許用並謹勉今擬除自運銷外并為代客辦運倘蒙委託特別効勞此佈

本號電報掛號三九三二
電話號碼一一一號

德昌祥錢紙號

文具紙張 印刷裝訂

表冊簿記 一應俱全
電話五二二一二號

文心印刷社
出品精良
定期不誤

地址：八條巷十四號

五七四二二：電話